

解决社会问题

——
五种透视方法

著者
马丁S·温伯格
厄尔·鲁滨顿
苏·基弗·哈密尔史密斯

1.269

吉林人民出版社

解决社会问题

——五种透视方法

著者：马丁·S·温伯格
厄尔·鲁滨顿
苏·基弗·哈密尔史密斯

译者：单爱民
李伟科

吉林人民出版社

解决社会问题

——五种透视方法

著者：马丁·S·温伯格

厄尔·鲁滨顿

苏·基弗·哈密尔史密斯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科技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7印张 154,000字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册

ISBN 7-206-01447-X

C·67 定价：3.60元

本书简介

4
2
3
本书是一本社会学著作，它提出了五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论，这些理论着重于解决当今美国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当然，美国的社会弊端是由它的社会制度决定的，作者的这些尝试不会在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从宏观上看，它介绍的一些科学方法，对研究社会心理现象、认识社会问题以及如何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很有裨益。

本书广泛涉及了当今危害美国社会的诸多问题，包括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贫困化、人口问题、文化冲突以及吸毒、酗酒、青少年犯罪、同性恋等，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解决的方案。在每一种透视方法部分，作者都收进了美国当今著名学者的有关著述，这些著述覆盖面宽，在一定程度上抨击了美国政府的政策，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解决的自身矛盾，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美国社会和美国文化。

望广大读者去其糟粕，取其有益的方面，仅供研究参考。

目 录

第一章	社会问题及解决办法	1
第二章	社会病理透视法	8
	美国文化的破裂点	14
	亲近的行为	23
	超越男子汉	34
第三章	社会失控透视法	48
	人口政策问题	53
	超越官僚主义	63
	未来的新体制	71
第四章	价值冲突透视法	82
	黑人及不平等教育	89
	反强奸运动	97
	组织穷人	110
第五章	越轨行为透视法	121
	精神病患者疗养院	128
	戒酒协会	139
	戒毒协会	145
第六章	标签透视法	167
	放宽大麻法	176
	同性恋及其污名	187
	不干涉政策	194
第七章	解决办法综述	208

第一章 社会问题及解决办法

我们随时随地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环境污染、贫穷、犯罪、腐化、歧视、吸毒、工作效率低、通货膨胀、青少年犯罪……。有时，某个群体把某种情况看作社会问题，其他人也可能完全接受。但若提到解决办法，分歧就产生了。一些人认为某种办法事半功倍，另一些人却可能认为它会引起更大的问题。例如，一些生活态度严肃的人认为，人工流产合法化是令人反胃的，必须修正宪法，视其为非法行为。而支持这项立法的人会说，这样的修正得不偿失，他们提到了尴尬的生育、虐待幼儿、不安全的流产犯罪、天生缺陷以及人口过密等现象。在他们看来，前者的“解决办法”所能解决的问题，比之这种办法的副作用要少得多。

解决社会问题是件相当棘手的工作，这是无庸讳言的。即使学者们都同意某件事是社会问题，但在解决办法上，他们也会产生极大的分歧。通常，采取某种办法以后，一大堆新的问题会接踵而来。

我们在以前的一本书中提过，社会学领域的扩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认识和解决社会问题。多少年来，社会学家们摸索出了许多观察社会问题的方法，包括认识问题，诊断其因果关系，进而想办法去解决它们。这些对社会问题的不同解释，被称之为“透视法”。在本书中，我们将重温大

多数社会学家采用的五种透视法。在每种透视法之后，我们将提供同类的解决问题的实例和与之相应的行动方案。然而，我们必须首先弄清“什么叫社会问题”。

社会问题的定义

大多数社会学家一致认为，所谓社会问题，指的是一种公认的状况，它在价值观念上偏离了引人注目的人的认识标准，这些人要求采取行动来改变这种状况。下面，让我们再深入地讨论一下这个定义。

一种公认的状况：有问题的现象被注意到、被谈论，说它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未发生之前，大多数社会学家不把它看成是社会问题。例如水门事件，当政府的窃听网络、渎职行为和包庇活动被公布之前，我们就不把它划作社会问题。一旦报纸揭发了这一丑闻，国会对此进行了调查，以及随之而来的刑事起诉，让人们知道并议论这一情况，这时，它才真正地上升为一种社会问题。

另外，如若有相当数量的人认为某一问题存在，不管他们所持的信念错误与否，这个问题也有资格作为社会问题。在欧洲和新英格兰发生的巫术案就是明证。信巫术本身是错误的，但这种信仰却是极为真实的。既然人们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并要求采取行动来加以解决，那么，我们就把它看成是对他们而言的社会问题——尽管我们认为他们信仰巫术是荒谬的。

价值观念偏离：确认某种情况是社会问题，主要是由于它对某种重要的价值观形成了威胁，如道德标准、宗教信仰或经济利益。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对某一群体而

言的社会问题，对另一群体却可能无关重要。吸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反对吸烟的人认为，被迫吸入别人吐出的烟雾，一是限制了他们的自由，二是损害了他们的健康。因此，他们反对一切烟草广告或引诱青少年吸烟的宣传。相反，人们在饭店里或飞机上也常听到吸烟者呼吁他们的“权利”。此外，烟草商们则叫喊，禁烟宣传与我们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相矛盾。所以，我们说，公认一个社会问题总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要在相当程度上服从于公众的舆论。

引人注目的人：什么叫“引人注目的人”，对此没有什么确切的定义。实际上，这也并非是人数的问題。某一群体或少数派，若能以一件顶呱呱的事轰动整个社会，他们就是引人注目的人。在这种意义上，一些人明显地要比另一些人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比方说，在确认社会问题上，成年人往往比孩子更令人注意。某种职业的工作人员，如新闻记者、政治家，尤为整个社会注意。在确定某事为社会问题时，我们常常认为，那些被组织到一块儿的，占据领导职位的，或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强有力的人是更引人注目的人。

要求采取行动：某事若以一个社会问题出现，必须伴有某种行动的要求——来改进这种局面。假如没有这种要求——人们都漠不关心，逆来顺受，大多数社会学家都不会把这种情况看成是社会问题，不管有多少人深受其害。例如，歧视妇女的问题再次被提出来，是作为一种社会问题出现的。因为，当代的女权主义者组织起来了，她们要求改革，并积极地为工作。不同的是，50年代，当歧视妇女的问题首次提出时，尽管当时人们谈论这一问题要比现在多

得多，但它也不被看成是社会问题。

解决社会问题

公认社会问题，要求采取行动，与制定和实施具体规划，解决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例如，让别人注意某一问题，常常很快亦很容易就能办得到，但倘若真的采取某种措施来解决它们，你将会遇到数不清的障碍、拖延和挫折，并且，还需要巨大的牺牲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在解决某一社会问题的时候，那些直接受害者之所以能成为最靠得住的同盟者，就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能理解这个问题，更具有有一定的牺牲精神，而未直接受害的人便不容易做到这一点。一些戒酒、戒赌和纠正虐待儿童行为的自我帮助团体所以成功率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确定一个社会问题与着手解决它的另一重要区别在于：二者的思想基础不同。一个问题的定义中经常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词藻，在这一阶段上，“被威胁”的价值常常被具体化到可怕的程度。一旦人们确认这一特殊情况确属社会问题时，对于价值和理想的关注就降低了，转而在极其现实主义的办法来解决它。在理想主义的解决办法和现实主义的解决办法之间，常常有很大的差距。再者，人们经常会看到，虽然某种情况是有目共睹的社会问题，但一些重要的社会力量老是牵制着改进它的努力，这其中的原因是很明显的，耗资去解决某一问题同这个问题本身一样，都是不愿为人们所接受的。例如，有人建议发展一种疫苗来防治性病，就象我们现在给小孩种麻疹疫苗和百日咳疫苗一样。然而，这个建议马上受到公众的抗议，正如有些批评家说的那样，它亵渎了

大众的德行。另外一个例子是关于能源和污染的问题。为了减轻大气污染，前些年，曾经鼓励过工厂和电厂以天然气代替煤作燃料。然而，一经试行，国家马上面临着天然气和石油的危机。因此，这些厂家又被迫重新使用煤作燃料。其原因就是为减轻空气污染而增加天然气消耗的花费太昂贵了。

最后，在两个不同的阶段中所投入的人员和工具是截然不同的。社会问题常常是新闻记者、教会领袖或政治及社会活动家确定的。一旦他们唤起了民众的注意，就是说，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苗头了，这些占据高位的人便溜之大吉，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到其它问题上去。例如，黑奴被解放并给予公民权之后，很多以前的废奴主义者不是把注意力转到犹他州的摩门教多妻制，就是转到酗酒和女权等问题上。越南战争快结束时，情况亦大致相同。很多反战的积极分子又变成了环境保护运动中的活跃人物。对于新闻记者来说，他总是闲不着的。

领头的人都跑了，谁剩下来收摊呢？这些工作常常留给立法者、福利机关或政府其它部门。从这种意义上说，给问题下定义有结束的时候，但解决问题的则必须是年年进行、日日进行。由于长期规划部门和执行部门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麻烦，为了便利工作，他们说不定也会去求教些看起来头头是道的规程设计。但这些规程对于切实解决问题，常常是左支右绌，完全不似设计者所想象的那样天衣无缝，放之四海而皆准。

观察社会问题的透视法

透视法很简单，就是指看问题的不同方法。这里指的是

观察社会问题的不同方法。相同的情况或事件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去透视。同一个社会问题，常常会被不同的群体采取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透视法来观察。例如，制造商与那些住在工厂附近、没有直接享受其利益的人，对工厂污染空气的看法大相径庭。同样，对于失业现象，厂主和雇工的看法也截然不同。通常，我们认为，人们对社会问题的透视角度决定于他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意识上所处的地位。

透视法在观察社会问题上的运用有其时代特征。一种透视法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被普遍应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失去这种普遍性，或许，过了一阵子，人们又把它拿出来重新使用。这是历史的波动经常与大的社会事件（如战争）、或与某社会团体的力量上升（如女权主义者）相关联。

定义 每种透视法对一个问题的性质，都有它独特的规定。五种透视法的侧重点各不一样，它们各自提出了不同的对人和对社会本质的基本假设。例如，对待吸烟问题，一种透视法可能把它规定为“社会道德水平下降”；另一种透视法会简单地把它规定为个人的“不太正常的行为”；第三种透视法可能会认为，问题不在于烟草使用上，而在于社会没有以法律手段给烟草使用者打上烙印，再把他们从人群中异化出来。

原因 每种透视法都用自己的概念组合来说明产生某一社会问题的直接原因。也就是说，不同的透视法对同一个社会问题的指责对象不同。

条件 除了重视研究诱发社会问题的直接原因之外，透视法还注重考察社会问题可能发生或发展的背景条件。这些背景条件总是在这些透视法中时隐时现，并经常与对人的本

质和社会现实的基本假设相关联。

结论 所有这五种透视法均把社会问题看成是有害的，但是它们对社会问题在哪些范围中起坏的作用，或对谁产生危害的看法存在分歧。

解决办法 各种透视法都有其解决某一社会问题的不同的建议。相比之下，有的透视法可能更趋向改革。但是，无论哪种透视法，它所关注的都是实行什么样的解决方法，以及如何去实行这些方法。因此，解决方法与一个人如何限定问题，如何看待它的原因、条件和有害程度密切相关。由于各种透视法有其不同的对社会问题的概念组合，因此，同样是一个社会问题，一种透视法所提议的解决方法与另一种透视法所提议的解决方法，经常是风马牛不相及。正因为如此，我们当中一些人抱怨说，关键不是现在的问题太多了，而是那些横七竖八的解决方法太多了。

应该说明的是，并不是任何解决办法都一定与本书阐述的透视法相符，但大多数社会学家所建议的解决办法都能反映一种或几种透视法的交叉使用。有些由政治家、作家、社会活动家和其他一些人所鼓动的解决办法也是如此。

本书的计划

下面诸章，每章将讨论一种透视法，回顾它的历史演变，对它所建议的解决办法进行归类。选择的阅读材料揭示了如何用这种透视法来透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总结一章贯穿各种透视法之间的关系，并说明这些透视法是如何被选择，以及在实践中怎样被用来解决我们社会面临的许多问题。

第二章 社会病理透视法

在观察社会问题的五种透视法中，社会病理透视法是最早的一种。它在19世纪末期得到发展，本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它的全盛期。在此期间，人们观察着周围万物的变化，发现这些变化总是越变越好，因此，他们对社会的进步和发达充满了希望，一些当时的领袖们认为，一个伟大的新时代正在破晓，人类受苦的日子即将一去不复返了。正值上一辈人循规蹈矩、听天由命的时候，一些19世纪末期的社会改革家们打破了常规，坚信人类有能力改变厄运。他们认为人道主义和道德情操是完善社会、根治痼疾的关键。这样，在改革派的热心倡导下，一种旨在切实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病理透视法发展起来。

社会病理透视法是在进化论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851年，达尔文发表了他的划时代的著作《物种起源》。这本书奠定了生物进化论的基石。后来，研究社会理论的人们，把达尔文的进化论运用于他们的社会发展理论中，把文明和社会制度都看成是由简单到复杂，再从复杂到高度发达的进化过程。

社会进化论的观念是通过对有机物进化所作的类比实现的，理论家们认为，这种类比表明，社会同有机体一样，都是既复杂又可分的整体。一方面，它们同样可以生长、演变、进步，另一方面，它们也同样可以生病、发育不良，甚

至死亡。社会病理透视法所使用的主要概念是健康与疾病，正常与非正常。社会问题危害着社会有机体的健康。因此，社会科学家们的任务就是要诊断并且医疗这种痼疾。

早期社会病理学家们认为，现存的一切秩序都是健康而且正常的。他们多数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成长在小城镇和农村环境，有些还是牧师子弟。这些人把美国乡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看成是正常的，而把背离这种规范的一切均说成是不正常的。他们想当然地坚持要把小城镇中的美德带到城市生活中来。认为，必须对人民进行道德教育，这样才能把他们从堕落中拯救出来。

正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社会科学家们开始把社会问题描绘成为“病态”的，需要“医治”的现象。他们把社会问题归咎于个人的病兆，或归咎于广泛传布的“社会痼疾”。早期社会病理学家把犯罪、青少年违法、酗酒、吸毒、私生子及精神失常等问题都看成是社会痼疾，认为这些社会痼疾能给人带来不可估量的痛苦。他们指责说，这些痛苦是由于贫穷的生活条件以及外国移民带进来的道德影响造成的。在另外一些场合中，他们指责那些反社会的群体，如小偷集团和职业娼妓等。这种观点在查理斯·亨德森（Charles Henderson）和塞缪尔·史密斯（Samuel Smith）的著作中达到了最高峰。

早期社会病理学家们考察社会问题偏重于它们在社会分层中的存在。例如，当时的学者们老是沿着家族的线索来寻找某些反社会倾向的原因。他们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某些家族具有更大的滋长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如酗酒、卖淫、私生子及意志薄弱等），而有些家族却世代代老是产生正直的公民。他们不把所有这一切看成是由于生活方式、

价值观念和经济条件决定的，反而把它归结为父子因袭的“坏血统”。另外，有些学者发现，某些招惹出的事端和犯罪行为总是在下流社会中频繁出现，因此，他们警告说，越轨行为始终存在于社会的原因是由于这些人还不断地生儿育女。当时的犯罪学专家们声称，“天生的罪犯”可以见诸他们的身体表征上。这些人之存在是人类进化过程的返祖现象——隔代遗传——他们生来就比有教养的人低贱。

早期社会病理学家觉得应该温和地对待这些有病的或低贱的个人，就象对待有病的孩子一样，不应该对他们一味严惩。为了防止他们的越轨行为影响他人，许多早期社会病理学家倾向于把他们从人群中分离出来，或者禁止他们繁衍后代。

本世纪 60 年代，社会病理透视法又重新复兴。然而，在许多观念上，新老社会病理学家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首先，现代社会病理学家不再象老病理学家那样，认为社会机体是完美无缺的，而把社会问题归咎于有问题的个人身上。相反，他们倾向于把个人看成是由病态的基础结构或由病态的社会所造成的牺牲品。他们认为，由于某些社会类型和社会条件中存在着固有的危险性、破坏性或否定人的基本需要的因素，因此问题就产生了。例如，一些现代社会病理学家热衷于谈论那些降低人性标准的话题，如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大众社会或美国帝国主义等。这些人有的关心原子弹的破坏潜力和电视暴力片的有害影响，有的则关心社会基础结构的退化问题（如官僚制）。最近这几年，谈论“有病的社会”是个热门话题。如想了解上述情况，请读埃里奇·弗罗姆（Erich Fromm），赫伯特·马克斯（Herbert Marcuse），查里斯·赖克（Charles Reich）及菲利普·斯莱特（Philip Slater）等人的非常有影响的文章。

早期社会病理学家们在评估什么是健康，什么是病态的问题上，常常是非常传统的、非常因循守旧的。他们觉得公众说什么对，什么就对。例如，宗教是好的（那么，它就是健康的）；犯罪是坏的（那么，它就是病态的）。但是，现代社会病理学家则向那些已为公众接受了习俗和基础结构提出质疑，他们常常攻击那些寻常人认为是可接受的、值得尊敬的东西，并把这些东西说成是病态的。

新、老学者们在论及问题的范围时，看法也不尽相同。早期社会病理学家一般把注意力集中到个人的越轨行为上——如酗酒、精神病等。而现代社会病理学家的注意力却更为广泛，他们注意到了那些战争、环境污染、人口过剩和贫困化等现象。

无论把社会问题归属哪种原因，有病的个人也罢，有病的社会也罢，有一点，新、老社会病理学家却是一致的，他们常常用道德和人道主义的标准来判断，把他们支持的现象和人看成是健康的、正常的，而把那些他们不支持的东西则看成是先天不足的和有破坏力的。这些判断常常用半医学术语来表达，如我们常见的不正常、紊乱、症结、痼疾、病理、病态以及症状等等。他们的人道主义热情则由下列词汇来表达：异化、焦虑、自觉、非人道、人性降低、感觉、人的本性、人道主义、爱、需要和社会意识等等。不管采用医学术语，或采用人文术语，社会病理学家认为，社会问题绝对含有非道德的成分，他们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建立一种道德责任感。

对于社会病理学家来说，社会问题需通过道德改造加以解决。早期社会病理学家认为，应对那些个人“越轨者”采取道德教化，以防止他们把道德缺陷传给下一代。早期社会

病理学家的这种努力经常是传道式的。如在芝加哥市的赫尔收容所（Chicago's Hall House），改革家们与所谓的“越轨者”面对面地接触，试图向他们灌输中产阶级的道德和习惯。在另一些场合中，改革的努力则指向防止这些病症蔓延。例如，改革家们四处游说，要求建立特别的机关来处理 and 收容那些执拗的或依赖性强的年轻人，以防止他们受到成年罪犯的“污染”。（当时孤儿和被遗弃的年轻人经常以犯大罪、蹲大狱而告终，主要原因就是当时缺乏分离的条件）。很多早期病理学家还赞成选择生育（即优生）的观念，认为这样一来道德缺陷就不致影响后代了。他们都是“血统论”的追随者，认为血统的好坏决定是否酗酒、卖淫、以及精神失常和意志脆弱等等。

如前所述，现代社会病理学家不把社会问题归咎于个人越轨者，而是把它们归咎于整个机体——有病的社会及不合情理的基础结构。他们认为，只有修膳社会及其各个基础结构，社会问题才能解决。但是从何做起呢？首先，必须得让人们认识到这种改变的必要性，然后，再向他们介绍新的思想方式、新的价值观念和彼此相关的新的模式。通过这种提高认识，也许整个体制会发生变化，问题会得到缓解。

所有的解决办法都是试图以道德教育来改造思想。早期社会病理学家坚信人是向善的，只要他们自己做出榜样，就可以改变人们的命运。因此，他们主张积极地行动起来，抵制病态行为，恢复社会有机体的健康。他们不认为自己的道德水准是随意的、有阶级偏见的、甚至是追求某群体之利益而强加于人的。实际上，让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衡量一下，他们的那些标准，都多多少少偏离了人的本性和自然法则。

由于社会病理学家们相信道德教育的力量，因此，他们